

《教會好戰分子與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1440-1770)》

劉玲玲*

本文旨在介紹博克塞所著《教會好戰分子與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1440-1770）》一書。此書主要闡述 15-18 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兩國殖民運動與傳教運動的結合，尤其是教會在葡西擴張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如種族關係的問題、文化問題、教會機構組織上的問題、新基督徒的數量質量以及傳教熱情等問題。博克塞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拓寬了 15-18 世紀伊比利亞半島海外傳教活動研究領域的視野。

《教會好戰分子與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1440-1770）》（*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一書是由英國歷史學家博克塞（C. R. Boxer）執筆所著。15 世紀，葡萄牙、西班牙相繼開始了地理大發現時代，使羅馬教廷也將注意力轉移到了海外。在葡萄牙、西班牙廣闊的殖民土地上，滿懷宗教熱情的征服者和傳教士開始傳播基督信仰，殖民地的教會事業隨之開展起來。但在陌生的環境裡，殖民地教務的開展會遇到甚麼樣的挑戰、將經歷怎樣的過程呢？對此，博克塞在這本著作中作了比較系統的闡釋。

博克塞，1904 年 3 月 8 日出生於英國樸茨茅斯附近的懷特島（Isle of Wight）的山唐（Sandown）。他的父親與兄長都是軍人，在家人影響下，博克塞也於 1924 年 1 月參軍入伍。六年後他被派往日本學習語言和文化，並觀察日本的軍事活動。博克塞成為一名軍官的同時，也成為一位多產的學者。他的研究旨趣在於荷蘭、葡萄牙帝國的歷史及其在遠東的活動。⁽¹⁾ 在著名耶穌會歷史學家約翰·科雷亞·阿豐索（John Correia Afonso）主編的《葡屬印度歷史：資料與問題》（*Indo-Portuguese History: Sources and Problems*）一書中，曾對博克塞有這樣的評價：“他是當今最有資歷最令人尊敬的歷史

學家，約有四十部著作……”⁽²⁾ 諸如著名歷史論文集《葡萄牙貴族在遠東（1550-1770）：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幻想》（*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專著《日本基督教世紀（1549-1650）》（*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葡萄牙航海帝國（1415-1825）》（*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等，其皇皇鉅著，成果輝煌，表明了博克塞深厚的功力和過人的精力。博克塞在豐富的著述中，不乏對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在伊比利亞兩國殖民地活動的記敘與感悟，如 1960 年出版的《澳門的傳教士與商人（1557-1678）》（*Missionaries and Merchants of Macao, 1557-1678*），但如此全面而系統的論述恐怕祇有在《教會好戰分子與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1440-1770）》一書中才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本書的前言裡，博克塞提到，他是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主任之邀，於 1976 年前去曾到該校作了四篇學術報告。系主任建議他把這四篇學術報告的主題定為“1415-1825 年在非洲、亞洲及美洲的非歐洲人的基督教化”，因此博克塞開始關注作為 15-17 世紀羅馬天主教會左膀右臂的葡萄牙、西班牙在其殖民地對於傳教事務的目標與態度問題。⁽³⁾

* 劉玲玲，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由於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在一本書中不能盡而言之，博克塞於是選取了四個比較突出的方面（即本書的四個章節）以窺斑見豹。1978年，此書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本書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章涉及種族關係問題，主要集中於本地神職人員與黑人奴隸貿易兩方面。博克塞分別探討了葡、西所屬殖民地本地神職人員的培養和發展情況，包括西非、東非、果阿、西屬美洲、日本、中國、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地。由於地理大發現的到來，在葡萄牙向非洲黑色大陸部分拓展版圖與經貿關係時，許多西非人被帶往葡萄牙，其中一部分人成為奴隸，一部分成為自由人，並且許多人後來接受了基督教教育與訓練。⁽⁴⁾剛果國王阿豐索之子恩里克便是一例典型。他後來被提名為烏提卡的主教。他於1521年重返剛果，約十年後因疾病困擾而去世。阿豐索還向葡王送去一些年輕人學習基督教教義，可是很少有人回到故鄉。他們之中許多人在完成學業之前就已亡故。阿豐索國王的一個侄子選擇留在葡萄牙，成為了一名教師，而且在葡萄牙結婚。這似乎是培養本地教士的一個開端。1518年教宗簡論中也提及要求皇家教士要去祝聖那些已達到神父水準的“衣索比亞人、印度人和非洲人”⁽⁵⁾，但是奴隸貿易的競逐打破了這一良好的開端。

西非是奴隸貿易的發源地，葡萄牙人則是始作俑者。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土地上，黑人奴隸數量眾多且頗受歧視。博克塞運用資料進行了生動的說明。捷克羅日米塔爾的波希米亞利奧爵士於1466年抵達葡萄牙，當他離開阿豐索五世的宮廷時，國王要饋贈給他禮物。這位波希米亞人要求送給他五名黑人奴隸。國王聽到這個請求後哈哈大笑，說他可以要更有價值的東西，因為在葡萄牙幾乎“有成百上千或更多的衣索比亞人，他們就像牲口一樣被買賣着”⁽⁶⁾。在殖民地，尤其是在非洲，幾乎每天都有許多人被奴役或被劫掠，一些傳教士也參與其中。教會雖然也批判奴隸貿易，但有時態度是很寬容的，甚至時常含蓄或明確地支持黑奴貿易，如在1462年10月7日的簡論

中，教宗雖指責了西非奴隸貿易，但這個文件祇是批評了那些參與劫掠、買賣加那利群島、幾內亞的新基督徒的人。⁽⁷⁾其中部分原因也是教士的聖薪等日常生活的開支須由奴隸貿易而來。奴隸貿易還帶來了種族偏見，使本地神職人員倍受歧視而導致發展滯緩。培養本地教士的重要機構神學院遲遲不能在殖民地建立起來，或是歷經波折才能開設一所規模較小的訓練班，但又經常被關閉。到17世紀時，非洲的神學院設立何處仍然未定，國王也沒撥多少資金。1625-1669年建立在聖薩爾瓦多的小型耶穌會神學院以及在盧安達(Luanda)一個存在稍久的神學院均是由一個從事奴隸貿易的富裕商人所捐贈的。⁽⁸⁾這個問題在一個多世紀裡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後來教宗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執行培養本地教士的政策，但又時常受到伊比利亞兩國國王的阻攔。⁽⁹⁾當教宗幾次重申要在墨西哥設立神學院後，兩國國王均表示不去祝聖那些葡西與當地人通婚的後代。⁽¹⁰⁾

第二章主要論述文化問題。博克塞引用了彼特·蓋伊(Peter Gay)的觀點：“即使是最友好的基督徒也必定認為祇有他們的信仰才是絕對正確的(因此其他信仰都是極端錯誤的)，異教徒無意中成為首先需要被上帝之榮光照耀的人，他們罪孽深重，靈魂卑劣。”⁽¹¹⁾幾個世紀以來，這種觀念根植於大多數歐洲人腦中，那些去海外給“愚昧的異教徒”傳播福音的許多傳教士們對此更是堅信無疑。起初祇有少數傳教士肯去花費大量的精力與時間學習當地的語言，瞭解居民的文化與信仰，如墨西哥的薩阿貢(Sahagún)、中國的利瑪竇(Ricci)、印度的諾比利(Robert de Nobili)。擁有宗教與文化極度優越感的歐洲基督徒認為，祇有他們才“擁有拯救世界靈魂的唯一鑰匙”，相當漠視非西方文明。當兩種文明發生衝突、宗教信仰產生矛盾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往往刀劍相向，用武力鑿平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其結果就是更加加深了當地居民的反抗、排斥情緒。

為了更有效地使信仰廣播，在歐洲文明與非歐洲文明相遇時，教會在擴張中不再對當地文化充滿

鄙夷與敵意，而是一定程度上予以調和。博克塞主要談到教會將一些教義問答書、福音小冊子等宣傳作品翻譯成當地語言，以便於傳教士在殖民地教務的開展。如第一本用班圖語出版的雙語基督教教義問答書就於1624年在里斯本發行的。1539年第一本用西班牙語與那瓦特語寫成的教義問答書在墨西哥城發行。⁽¹²⁾在印度、菲律賓、中國、秘魯、巴西等地也都有翻譯成土語的宗教作品傳播。耶穌會士因其選拔本修會成員的標準極嚴，會士具有很高的學術修養和文化底蘊，他們在學習語言方面的優勢比較明顯，因此在翻譯宗教書籍等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由耶穌會士翻譯出版發行的教義問答書遍及從中國到秘魯的廣大地區與國家。在耶穌會於1759-1773年遭鎮壓期間，雖然會士被驅逐、關押甚至死去，但這都沒能阻礙耶穌會在這方面的工作。⁽¹³⁾

儘管“從烈日炎炎的非洲到白雪皚皚的西藏”，傳教政策有了一些變化，但是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在教會擴張遇到殖民地各自不同的文化時，他們的態度也是不盡相同的。“這些西方的征服者認為亞洲文化相對最高，儘管仍次於西方文化；主要的美洲文明（阿茲台克、印加、瑪雅）次之；而非洲人、加勒比人、圖皮人及其他蠻族則處於文化水平的最底層。”實際上這種劃分出自於耶穌會士若瑟（Padre José de Acosta）之手，儘管他也補充說這種分類並非一成不變，但他的觀點還是得到了大多數在非洲活動的傳教士的認同。⁽¹⁴⁾那些傳教士認為非洲班圖祇處於半開化狀態，抑或根本沒有文化。對此，一些人包括幾位傳教士發表了不同見解。他們曾樂觀地向上報告：“安哥拉的異教徒是在非洲幾內亞地區最適於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他們是很聰明的，儘管那些歐洲人不瞭解他們的語言並把他們當作小丑……這也是神父為何努力學習他們語言的緣故，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就能與他們融洽相處，將他們改宗為基督徒也就不會那麼困難了。”⁽¹⁵⁾博克塞還舉例說，一名耶穌會神父也曾指出贊比西的一群班圖人能傾聽葡萄牙貴族撥弄吉他。在文化較高的美洲和亞洲，葡、西征服者和傳教士也逐漸嘗試去瞭解他們的風俗習慣和宗

教信仰，如在美洲有著名傳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貝爾納迪諾·德·薩阿貢（Bernardino de Sahagún）等人；在印度傳教的諾比利、貢加諾·費爾南德斯·特蘭科索（Gonçalo Fernandes Trancoso）、帕德雷·費爾南奧·德·克·羅茲（Padre Fernão de Queiroz）；在中國活動的著名傳教士利瑪竇；日本的葡籍神父帕德雷·若奧·羅德里格斯（Padre João Rodrigues）等等。這些傳教士花費大量精力學習完全陌生的語言，考察各種風俗禮儀，使基督教信仰與之有最大的適應化，對不同文化的認識與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博克塞在隨後的第三章中主要探討教會機構組織上的四個重要問題：

一、修會神父與教區神父的關係問題。依照教會教階制度的規定，一旦教區管理體制建立，教區教士就要管理教區信徒，並直接聽命於主教。然而，無論是在“異教”國家還是葡、西國王新征服之地，傳教的先鋒事業都不是由教區神父所開創的，而修會則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教宗於1522年確立了在殖民地及其教區管理上宗教修會團體的權威。⁽¹⁶⁾此後，教區教士的地位與資格就次於修會神父。印度果阿於1541年創辦了一所神學院，但18世紀前半期很少有畢業生成為修會成員，他們大多為教區神父，並飽受歧視，處於次屬地位。雖然通過大量發展教區教士的人數並提高其接替修會神父管理教區的資格，但這種努力需要太長的時間，尤其是在遙遠而荒涼的殖民地。不過，作為教會擴張的積極支持者與保衛者，修會團體的傳教士在殖民地所做的貢獻還是應該肯定的。在這裡，他談到了耶穌會。耶穌會士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赴遠東開始傳教事業以後，便活躍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用他們滿腔的熱忱去“拯救黑暗中的靈魂”。

二、傳教區與殖民地管理機構的合作問題。傳教士是葡、西兩國開疆拓土的中堅力量。傳教區作為殖民地的一部分，兩國政府自然有義務予以維護。當傳教活動遭遇抵抗時，殖民政府則動用武力加以解決。儘管拉斯·卡薩斯等傳教士不主張用刀

劍來推動福音的傳播，但大多數傳教士仍把武力作為最好的傳教手段。一位20世紀的西班牙耶穌會歷史學家康斯坦丁諾·拜萊（Constantino Bayle）曾說：“在有武力護衛的地方，基督教便能生根發展。而在傳教士不借助武力單獨傳教的地方，通常他們的傳教成效微小，並很可能殉道。”⁽¹⁷⁾當然，並非每個地方都充斥着血腥的味道。在西屬美洲、巴西、安哥拉、菲律賓，教會事業就在相對和平的狀態中取得了長久的成功。⁽¹⁸⁾不過，教會與世俗政府的合作仍是伊比利亞半島殖民擴張的一個重要特點。

三、保教權問題。這裡的保教權是指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兩個國家向外擴張時，與羅馬教會協作所採取的一項宗教政策。本着互惠的原則，葡、西與羅馬天主教會在廣闊的殖民地密切合作，世俗政府為教會福音傳播提供人力物力、地理知識等方面的支持，而教會則授予兩國君王在所屬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權、貿易壟斷權及宗教人事任免權等的多項特權。博克塞對保教權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他總結了教宗賦予伊比利亞國王的權利：1) 在保教權範圍內建立大教堂、小教堂、修院及修士居所；2) 向羅馬天主教會提供所有殖民地的大主教、主教、修士之職及與主教相關的較低一級教會機構神職人員的候選名單；3) 掌管教會的稅收，否決教宗的那些未經國王法院批准的通諭和赦書。⁽¹⁹⁾對於葡萄牙的保教權，這裡還應加上一點，即向亞洲進發的傳教士必須取道里斯本，向葡王宣誓效忠。起初，保教權的實行使教會與葡、西政府實現了雙贏格局，但處於國王直接控制下的殖民地教務發展卻不如意，教宗也意識到了保教權的破壞作用。於是，教廷開始逐漸削減其特權，成立了傳信部，設立了宗座代牧制。葡西兩國對此極力抵制，在西屬美洲與菲律賓，保教權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繼續實施着。而葡萄牙這個在16世紀開始退卻的帝國，其保教權則因其戰爭困擾、統治成本的增加、人力物力資源的減少等因素而陷入尷尬的境地。

四、宗教裁判所問題。在殖民地，本地信仰、迷信活動盛行多年，加上新基督徒對基督信仰的不堅定（本書第四章有具體闡述），於是在16世紀，

以教會純潔化為目標的宗教裁判所在葡、西殖民地設立起來。在西班牙天主教國王費迪南多與伊莎貝拉統治時期，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教會精神警察和國家政治警察”的完美結合而聞名，主要以控制異端（包括新改宗的摩爾人、有猶太血統的新基督徒）為目標。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設於1536年，果阿於1560年也設立了宗教裁判所，以審查新基督徒與文字出版物為工作重點。葡西宗教裁判所的目標不僅是維持伊比利亞半島神學的純潔與一致，還要對有可能威脅與誤導羅馬天主教教義的新觀點進行鎮壓。⁽²⁰⁾17世紀是葡西的宗教裁判所的黃金時代；到了18世紀，由於王權主義、啟蒙運動等的影響而漸失其作用。

在本章結尾，博克塞對這四個問題進行了一番小結：儘管修會教士與教區教士的緊張關係並不一定就是兩者合作的障礙，並有可能推動雙方的健康競爭，但這是教會明爭暗鬥的結果。另一方面，傳教區作為殖民領地的一部分，其先鋒作用是很明顯的，尤其是在美洲的土地上。葡西的保教權政策在17-18世紀日益密切了教會與政府的認同關係，並在布拉甘薩統治時期達到頂點。根據事後的認識，才明白它對海外教會的精神健康十分有害。而宗教裁判所的效力在18世紀晚期已經完全失去了。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博克塞主要關注的是三個方面。

一、新基督徒的數量與質量問題。為了取得羅馬教廷與葡西世俗政府的支持，為了使更多的人自願前往海外傳教，傳教士往往以樂觀的筆調來報告傳教事業的順利，如“新基督徒數量眾多，聰明且特別虔誠”之類，⁽²¹⁾但事情遠非如此。博克塞在書中寫道，穆斯林、猶太人及其一些不太重要的個別族群，他們對基督教福音的宣傳是無動於衷的，小乘佛教的教徒也基本上沒被緬甸、泰國、老撾及柬埔寨的傳教活動所影響。日本、中國的大乘佛教的信徒對福音宣傳更為敏感，儘管博克塞說他還不能解釋為何會如此。⁽²²⁾博克塞還援引了一些資料，對新基督徒的數目作了說明。在16世紀的日本和17世紀的中國，在那樣一個傳教事業的黃金時期，他推

測基督徒的總體數目不會超過 300,000 人。葡印的基督徒最多時也難以達到 200,000 人；菲律賓在經過約五十年的全力傳教後，到 1622 年時約有 500,000 名基督徒。⁽²³⁾ 在西屬美洲，從表面上來看，由於西班牙的有效控制使得其殖民地本地人基督化的過程快速而徹底。⁽²⁴⁾ 但新基督徒對信仰的不忠與表面化是殖民地教務的重大隱患。在他們的頭腦中，各種古老的風俗、儀式不時閃現，偶像崇拜仍十分普遍，而且強制傳教也不能盡使福音在人們心中真正地生根發芽。在這裡，博克塞引用了一個十分生動的例子：有幾名在印度的傳教士目睹了在 1 月 25 日舉行的歡慶聖保羅改宗的節日上，耶穌會士為了能實施典禮，舉行集體洗禮，在這之前，他們由黑奴陪伴穿越印度街道，而黑奴的任務就是奮力抓獲印度人，“就像獵犬追捕馬一樣”。當黑奴抓到逃竄的印度人後，就會在他嘴裡塞一塊牛肉，以使其拋棄種姓身份，成為受遺棄之人。於是改變信仰成為了他們唯一的選擇。⁽²⁵⁾ 他們這種方法遭到了很多批評與指責。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改宗者及其後代成為教會與王室的忠誠衛士。在日本禁教期間，一些五、六歲的小孩在被施以火刑時，也會高呼上帝。大批信徒因其信仰的堅定而成為殉道者。

二、偶像崇拜的堅持與混合性宗教的觀點。在歐洲，“許多人認為基督教本身是混合性的宗教，它屬於猶太教的分支，並糅合了希臘、羅馬因素。”⁽²⁶⁾ 這種觀點是與教會擴張分子的思想（無論是羅馬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是格格不入的。在伊比利亞半島上，尤其在葡萄牙，基督教與異教信仰相融的觀點是比較普遍存在的。⁽²⁷⁾ 一些儀式、巫術等迷信活動也深植於葡西人的頭腦中。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對此祇做了一般性的指責，西班牙則有相對嚴厲的懲罰。在海外殖民地，把基督教信仰與當地信仰融合在一起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在秘魯、剛果、莫桑比克、印度、中國及菲律賓等地，本地的宗教信仰或迷信活動依然屢禁不絕，而且有的儀式還滲透到了基督教信仰之中。1771 年果阿宗教裁判所曾發佈一份文件指責許多“儀式、典禮及迷信活動”，在莫桑比克的基督徒中廣泛流傳。⁽²⁸⁾ 秘魯的一名耶穌會士

也失望地說道，那些美洲人全部或至少大多數“像格拉納達的摩爾人一樣，空有基督徒之名，祇在表面上參加基督教的典禮。”⁽²⁹⁾

三、傳教士的宗教熱情問題。在海外殖民地，因其極其惡劣的衛生條件與氣候環境，再加上路途遙遠而險阻，許多傳教士不願前往傳播福音。但千年天國與神秘主義的流傳，激發了傳教士的使命感與靈魂深處的宗教熱情，他們把所有的精力甚至生命都奉獻給了海外教會事業。博克塞列舉了一系列數位來加以說明：佩德羅·德·甘特（Pedro de Gante）在墨西哥城一天可為 14,000 名美洲人施洗。1559 年，在新西班牙的整個殖民地，方濟各會擁有 80 間教堂與 380 個教團；多明我會則有 40 間教堂與 210 個教團；奧古斯丁會則有 40 間教堂與 212 個教團。也就是說，不到一千名的傳教士與修士負責管理幾百萬印第安人的傳教工作。⁽³⁰⁾ 雖然傳教工作面臨諸多困難，有些傳教士也因世俗利益驅動而降低了精神追求，但是總的來說，他們靈魂深處的宗教激情並未消褪，即使耶穌會在伊比利亞遭到鎮壓，仍有不少耶穌會士繼續前往海外從事傳教事業，開創一片信仰的天空。

在本書的結尾處，博克塞表明了自己的一些觀點。他認為，雖然在海外教會事業中存在種種問題，如有些新基督徒的質量不高，傳教士熱情的消滅等，但我們似乎應該從總體去看，畢竟很多人接受了天主教教義。作為教會積極擴張的支持者——傳教士也為教會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博克塞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在本書中他是將論證建立在堅實的史料與平實的敘事手法之上，用傳統實證的方法引出極具說服力的結論。清晰的構思與篇章結構，也顯示了作者優秀的學術水平。更難能可貴的是，我們知道研究教會史，尤其是天主教會史，首先面臨的難題便是語言認識的不足。要更真實地瞭解天主教教會歷史，必須懂得多國語言，而博克塞則堪稱典範。他能熟練地運用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拉丁語等多種語言的文獻資料，旁徵博引，用來揭開歷史的各個面相，亦由此表明了作者治學的嚴謹態度和深厚的學術功力。

關於伊比利亞半島海外傳教事業的研究成果中，許多作者是將其作為葡、西兩國殖民擴張活動的一部分，宗教活動的研究散見於各本著作中。而博克塞通過對15-18世紀兩國殖民地宗教活動的仔細爬梳，而集結成書出版，對研究葡、西殖民教會事業的意義自然不言而喻。而且，博克塞轉移觀察問題的角度，他的側重點不是傳教事業的成功方面，而是將目光更多地投向教會在葡、西殖民地擴張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以及所採取的應對措施，與由此引發的問題。非西方文明被排斥於主流文明之外，歐洲人極度的自信導致對殖民地文化的輕視，造成的後果體現在宗教信仰方面，便是本地教士發展的緩慢、教區神父倍受歧視的現象。這對教會信仰的傳播是不利的。本地神職人員不受重用不被信任，白人教士又因種種原因在殖民地難以生存，人員的缺乏給葡、西海外教務的發展亮起了紅燈。博克塞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拓寬了15-18世紀伊比利亞半島海外傳教活動研究的視野，具有相當大的學術意義。

【註】

- (1) 博克塞生平參見奧登著，顧衛民譯：〈博克塞，澳門，與耶穌會士〉，《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7期。
- (2) John Correia Afonso, S.J.: *Indo-Portuguese History: Sources and Probl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mbay, Delhi, Calcutta, Madras, 1981, p. 195.
- (3) (4)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reface; p. 3.
- (5) Brasio, *História e Missiologia*, pp. 308-13. 轉引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4.
- (6) Malcolm Letts, ed. and trans, *The travels of Leo of Rozmital through Germany, Flanders, England, France, Spain, Portugal and Italy, 1465-1467*. Hakluyt Society, 2nd Series, vol. 108 (Cambridge, 1957), pp.106-7. 轉引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5.
- (7) (8) (9) (10)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30-31; p. 9; 見前言; p. 21.
- (11)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2 vols., (NY, 1967), vol.1, p. 170. 轉引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39.
- (12)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41.
- (13) (14)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41; p. 46.
- (15) Fernão Guerreiro, S.J., *Relação An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partes da India Oriental, e no Brasil, Angola, Cabo-Verde, Guine, nos anos de 1602 e 1603 (Lisbon, 1605)*, p.128. 轉引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46.
- (16)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65-66.
- (17) *Missionalia Hispanica*, vol. 8. p.421. Cf. Magnus Mörner's comments on Bayle's article in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suits in Paraguay (Stockholm, 1953), pp. 200-201, 214-215. 轉引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1978, p. 74.
- (18) (19) (20) (21)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74; p. 79; pp. 90-91; p. 95.
- (22)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96.
- (23) John Leddy Phelan: *The 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panish Aims and Filipino Responses, 1700* (Madison, Wis; 1959) pp. 56-57. 轉引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79.
- (24) (25) (26) (27) (28) (29) (30) C. R. Boxer: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8, p. 97; p. 100; p. 104; p. 109; p. 106; p. 105; p. 113.